

記者的反叛與突圍

羅慧雯*

書名：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調查報導的構想與實現

作者：林照真

出版日期：2006年3月

出版社：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書名：媒體突圍

作者：何榮幸

出版日期：2006年9月

出版社：商周出版公司

* 作者羅慧雯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wlo@cc.shu.edu.tw。

長期以來，傳播學界常被批評傳播教育和現實是脫節的，學界生產的知識在實務界未必能用上。「理論與實務間有距離」是最普遍的說法，若此說法成立，不僅構成學界的自我定位危機，同時也是對大學傳播教育價值的質疑。

近年來台灣整體環境丕變，媒體競爭激烈，其利潤原則漸漸凌駕新聞專業，監督權力的功能越見弱化，代之而起的是向國家、經濟權力的靠攏，最明顯的例子是媒體甘於被政府與企業利用做置入性行銷。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想見的是，以揭發權力的腐敗為使命、並費時費力的調查報導，更難得到媒體高層的支持。然而，環境惡劣之極致就是反叛與突圍的開始，2006 年有兩本資深記者撰寫的與調查報導相關的書先後出版，讓我們看到惡質的媒體環境中仍存在著理想，一本是林照真的《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另一本是何榮幸的《媒體突圍》。前者是林照真以自身的調查報導經驗為基礎，結合調查報導相關文獻的探討與親身赴美、日對知名調查記者訪談而成的著作；後者是何榮幸描述他的四個新聞大獎作品的幕後故事，其中三個得獎作品是調查報導，一個得獎作品是評論。這兩本書既是實務界的教戰手冊，也具有學術價值，對形象正下滑的媒體實務界，或對本土案例不足的傳播學界而言，可說是出現的正是時候。

長期以來，傳播學界常被批評傳播教育和現實是脫節的，學界生產的知識在實務界未必能用上。「理論與實務間有距離」是最普遍的說法，若此說法成立，不僅構成學界的自我定位危機，同時也是對大學傳播教育價值的質疑。這些年來，我們看到許多傳播學者努力拉近和實務界的距離，而各大學的傳播相關研究所在職專班的設立，也多少達成拉

近距離的效果，可見學界與實務界的對話與互相理解，不是學界單方就可完成的，需要實務界共同參與。但現實是，由於傳播實務工作者的知識，往往帶有內隱知識的成分，與個別情境經驗有關，是主觀獨特的，不容易以語言和文字具體陳述，因此除非經過系統的整理和公開，他人難以瞭解，知識亦難以累積。林照真與何榮幸這兩部著作的最大意義即在於，他們將多年實務經驗累積出的個人的、內隱的調查報導方法系統化與外顯化，用心極為可貴。

在何榮幸的著作中，他詳細記載每一篇得獎作品的產製流程，從主題的發想、規劃、到採訪團隊的組成、採訪、寫作、編版……。他不僅讓讀者看到一篇篇對公共政策產生針砭作用的調查報導是如何產生的，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他遭遇了什麼問題，怎麼解決問題，而他所堅持的價值與信念又是什麼，都清楚的呈現。例如，在〈感受人民憤怒——「體檢公共建設」專題的幕後故事〉一文中，我們看到這篇報導緣起於作者帶著實習記者去訪問當時客委會主委羅文嘉，羅文嘉感嘆在大部分縣市長「只重硬體不重軟體」的迷思下，客家文物館淪為「蚊子館」，引發了作者體檢公共建設閒置浪費的動機。問題意識產生之後，他說服其他國會小組同事，得到他們的支持與共識，大家犧牲國會議員的暑期休假進行採訪，形成一個調查報導工作團隊。而在專題方向的擬定上，何榮幸不斷自我批判，想像可能面對的質疑，也企圖跳脫常見的從台北看天下的框架。作者的「幕後故事」中還包含版面的拉鋸戰如何進行。在本書的其他章節中，何榮幸也都提到版面爭取的協商過程，這種版面政治的描述，讓讀者瞭解報業組織運作的特性，正是一種內隱知識的外顯化。又例如在〈「休耕啓示錄」專題的幕後故事〉中，何榮幸提到他為專題名稱傷透腦筋，最後與同事腦力激盪後才拍板定案的故事。讀者可因此瞭解，原來就算是一個資深記者，在構思專題名稱時，也得花上

一些功夫。

而林照真將其內隱知識外顯的方式，與何榮幸的方式大為不同。她並不特別注重個人調查報導經驗的描寫（雖然她本身是個比何榮幸這個國會「路線記者」更為專心在調查報導的「調查記者」），她的著作本身就是一個「對調查報導的調查報導」，調查主題包括美、日調查報導的案例（果然是調查記者本色）。而美、日調查記者的經驗、調查報導理論的相關文獻、及台灣的媒體界現狀，在書中被整理得更為系統性。林照真多次強調身為調查記者務必要大量閱讀、並充分運用網路資源、檔案資料。她提到她報導西藏議題時閱讀到解密的國民黨中常會資料，因而感受到檔案之重要性。她也舉出美國使用電腦輔助調查報導，並在學院中開設相關課程的例子，說明運用好的方法，能掌握真實，發展更好的問題意識。甚至在附錄中，還提供了調查記者常用的網路資源與工具。

除了較為個人式的經驗傳授外，在兩人的著作中，也都提示了學科訓練及問題意識的發掘是作為調查記者不可或缺的核心競爭力。何榮幸說：「社會學訓練讓我在思考社會議題、確認問題意識時，會特別注重其所處的社會氛圍、結構性背景，以及這項議題可能牽動的社會影響與文化意涵」（頁 130）。林照真也提到記者必須很清楚自己的問題意識，才能在浩瀚的資料中，尋找方向。「問題意識的產生，與『新聞感』十分有關，這些議題關係到『公平』與『正義』原則，記者也要具備關懷弱勢的社會意識才行」（頁 40-41）。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林照真通篇都在強調調查記者的報導方向必須和公共議題有關，想必其用心在導正許多人以為狗仔隊進行的八卦報導也是「調查報導」的觀念。在第四章〈看門狗 vs. 狗仔隊—公義的調查報導與媚俗的醜聞揭發〉中，林照真區分挖名人隱私的醜聞報導和調查報導的不同，在於是

否符合「公義」與「公共利益」。她提到，調查報導的目的在揭露真相，「如果只是個人私事，就無關公眾利益。但如果可以發現國會議員或是官員犯罪，已直接撞擊民主的核心，就是公共利益」（頁 110）。因此，名人的「私領域」只有在涉及權力運作、誠實原則有關時，才是公共議題。這樣的解析破除了名人八卦的正當性。在第七章〈寫給公民看、還是寫給消費者看？—公共領域與調查報導〉中，林照真進一步的解釋，「調查報導像是媒體中的一塊民主基石，在調查報導的新聞世界中，提供的內容並非是輕鬆娛樂，而是有關公共事務的揭露與討論。因此，觀看或閱讀的是『公民』，而非『消費者』」（頁 160-161）。而何榮幸不僅關注公共政策的發展，更是以「公共型知識份子」自居，他說，「記者在大多數時候固然應該是保持中立的觀察者，但在自由民主、基本人權、媒體改革等重要公共領域卻不容缺席，有時更應扮演捍衛重要價值與信念的鼓吹者，在不違背新聞專業的前提下善盡公共型知識份子的責任」（頁 339）。

從以上所述大致可瞭解兩本書都以新聞理念為主軸，並輔以內隱知識外顯化來貫穿全書。那麼，為什麼這兩本書的作者要將他們的專業方法論不藏私地公開出來？他們是怎麼樣看待自己以記者的身份出書？兩者的書名開宗明義地回答這個問題。

何榮幸在書中自述曾受到《當代》雜誌第 102 期 Kent MacDougal 的「在主流報業內激進」一文的感召，想在主流媒體的專業規範與遊戲規則中，「偷渡」某些與主流立場不同的想法（頁 318）。而這就是「媒體突圍」的工作，「任何新聞工作都無法一開始就實現理想，必須歷經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劇烈拉扯，在主流媒體內不斷爭取空間、尋找出路並長期累積後，才可能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中摸索前進、求取平衡」（頁 27）。這段話清楚地表達了何榮幸在理想與現實的衝撞中走

了過來，因此他要將心情故事與經驗寫下來，給有志於新聞工作者參考。林照真則鼓吹記者反叛，她認為媒體改革的願景之一是媒體人的自覺，所以她希望「能從尋找工作者的反叛開始，讓每一個記者從一個權力監督者的定位努力起，也就是在台灣尋找調查報導的精神，建立屬於台灣本土的調查新聞學，讓工作者與年輕一代不再飄浮於市場之上」（頁 314）。這或許是林照真為何在書中大量援引美國、日本的調查報導案例的目的，她要以他山之石鼓勵台灣的記者一起來「建立台灣本土的調查新聞學」。

兩位作者都是為了將經驗傳承給其他新聞工作者，為了台灣媒體界的整體提升而寫，為了台灣民主社會而寫，為了公共利益的實踐而寫。每個傳播相關科系的學生或有志於新聞工作者，都應該讀讀這兩本書，理性地思考記者的理想，感性地感受記者的熱情。對於想要評估自己是否適合記者這一行，或是想砥礪自己完成新聞志業的理想的人而言，這兩本書更堪稱是經典之作，值得深入閱讀。